

环境与组织因素组态效应对新创企业绩效的影响

——基于模糊集的定性比较分析

许为民¹, 刘鑫蕊¹, 焦伟伟²

- (1. 东华大学旭日工商管理学院, 上海市, 200051;
2. 河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河北保定, 071000)

[摘要] 基于组态理论, 探讨影响不同新创企业间绩效差异的多重并发因素和因果复杂机制。利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对 237 个样本企业进行分析, 深入探究由环境层面的 2 个条件与组织层面的 3 个条件组成的不同组态与新创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 ①高创业机会识别、高创业拼凑和高创业学习都是新创企业产生高绩效的必要条件, 缺乏高创业机会识别、缺乏高创业拼凑是非高绩效产生的必要条件; ②新创企业产生高绩效的驱动机制分为 4 条路径并概括为 3 种构型模式; ③抑制新创企业绩效水平的路径和促进绩效的路径具有非对称性的特征。

[关键词] 新创企业绩效; 驱动机制; 组态; 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

[中图分类号] F27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893X(2021)02-0114-12

一、引言

近年来, 关于如何提升新创企业绩效一直是创业研究领域的热点^[1]。全球创业观察(2018)报告指出, 中国新创企业可以存活 1 年的只有五成左右, 总的成功率不足 5%。那么为什么只有极少数的新创企业能够克服重重创业障碍, 不断更新自身价值体系, 从而实现并保持卓越的创业绩效呢? 根据战略管理理论可知, 如果新创企业能够将企业内部资源或能力不断与动态多变的外部环境进行完美匹配, 那么它们必能赢得持续竞争优势, 获得高创业绩效, 实现成长并得到可持续发展。Aldrich 和 Martinex^[2]的研究也指出, 创业企业的组织因素与环境因素之间的匹配关系对于企业的生存与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那么新创企业的环境与组织各因素该如何匹配去获得竞争优势来提升新创企业的绩效呢? 这个问题非常值得深入探究。

新创企业绩效是受多种因素共同影响的。但

是总结发现, 现实中很多新创企业本身在外部环境、内部文化、资源和能力上就存在异质性, 加之各个研究的样本和数据处理方式等的不同, 现有研究得出的新创企业绩效影响机制并不一致^[3-4]。虽然学者们承认新创企业绩效受多种因素共同影响的事实, 但以往研究大多使用回归分析等定量方法回答自变量 X 与结果变量 Y 之间的平均净效应, 研究单一因果关系或内部作用机制问题, 对于管理实践中复杂的因果关系以及前因不对称问题, 传统回归分析等方法并不能适用于探究。也正是由于传统研究方法的局限性(假设变量相互独立), 现有研究就无法探究新创企业内外部各因素相互依赖和相互作用对新创企业绩效的组态效应, 所以就难以知晓该如何将新创企业的环境与组织各因素进行匹配来赢得持续竞争优势以提升绩效, 也无法探求新创企业绩效实现路径的多样性, 就难以解释新创企业绩效影响机制不一致的问题。这严重限制了对新创企业绩效影

[收稿日期] 2020-06-19; **[修回日期]** 2021-04-01

[基金项目] 河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创业学习对家庭农场创业绩效影响机制研究”(HB20GL051)

[作者简介] 许为民, 上海人, 东华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副教授, 主要研究方向: 创新创业、战略管理、领导力, 联系邮箱: xuwm@dhu.edu.cn; 刘鑫蕊, 河北衡水人, 东华大学工商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 主要研究方向: 创新与创业管理; 焦伟伟, 河北保定人, 河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 主要研究方向: 战略与创业管理

响机制的理解, 亟须找出使新创企业产生高或非高绩效的具有较高解释力的原因。

鉴于此, 本研究以组态理论为核心, 从整体论的视角出发, 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的方法, 试图探究环境层面的 2 个条件(环境动态性和创业导向)与组织层面的 3 个条件(创业机会识别、创业拼凑和创业学习)相互依赖的复杂关系对新创企业绩效的影响, 挖掘多条不同的新创企业绩效提升路径, 以期明晰新创企业的组织因素应该怎样与环境因素进行匹配来获取竞争优势以提升绩效, 并解释新创企业绩效影响机制不一致的问题。因此本文提出下列几个具体的问题: 为什么有些新创企业能够实现并保持高绩效, 即哪些路径组合可以促进新创企业产生高绩效? 哪些路径又会制约新创企业的绩效水平? 其中的前因条件中核心条件和边缘条件又是什么? 本研究试图为我国新创企业的生存与发展做出一些理论贡献和实践指导。

二、文献综述与模型构建

目前, 学界对于新创企业的定义标准尚不一致。本研究借鉴 Zahra^[5]的研究将新创企业界定为经营年限在 8 年以内的处于初创成长阶段的创业企业。作为新创企业经营成果的一种具体体现方式, 新创企业绩效成为衡量新创企业是否成功的关键因素。国内外学者对新创企业绩效的影响因素展开了大量研究并取得了丰富成果, 这些研究主要是从环境和组织两个层面因素展开的。经过梳理大量文献, 本研究把影响新创企业绩效的环境层面因素分为外部和内部环境条件, 分别对应着环境动态性^[6]和创业导向^[7]。根据新创企业的特征, 从过程论视角分析 Timmons^[8]的创业过程模型, 总结出 3 个关键的影响新创企业绩效的组织层面因素: 创业机会识别(机会)、创业拼凑(资源)和创业学习(团队)。

作为企业的外部环境条件, 环境动态性是指企业面临的外界环境变化的速度和幅度, 反映了企业对于环境变化的不可预测性程度^[9]。它为新创企业绩效水平的不断波动提供了更为全面的解释, 成为企业管理研究领域的重要外部考虑因素^[10]。环境动态性对新创企业绩效的影响是极其复杂的, 它对新创企业创业过程中的机会、资源

和团队都会产生影响从而间接影响新创企业绩效的水平^[11](具体影响方式见表 1)。作为组织内部的环境条件, 创业文化以“企业文化—态度—行为—绩效”的实现模式对企业绩效产生影响^[12]。有部分学者认为创业导向代表着企业关于创业精神的观念体系和心智模式, 反映在企业的一贯过程和公司文化中, 这背后体现出的是一种精神、一种做事和思考问题的习惯^[13]。因此本研究将创业导向理解为一种能够为企业带来可持续竞争优势的组织内部文化。现有文献从不同情境角度出发检验了创业导向对新创企业绩效的促进作用, 具体有三种影响方式(见表 1)。

根据新创企业的特征, 本文从过程论视角分析 Timmons^[8]的创业过程模型, 总结出 3 个关键的影响新创企业绩效的组织层面因素: 创业机会识别(机会)、创业拼凑(资源)和创业学习(团队)。Timmons 的创业过程模型认为创业过程是创业机会、资源和团队之间适当匹配的高度动态平衡过程。首先, 创业机会理论指出, 创业机会是创业过程的核心要素^[8, 14]。新创企业在创业初期关键是挖掘、识别和开发创业机会, 因此新创企业的发展离不开创业机会识别的过程。已有大量研究表明, 创业机会识别有助于新创企业获得高水平绩效^[15-17]。其次, 资源基础理论认为资源是创业过程的必要支持。对于面对资源约束困境的新创企业而言, 通过充分利用手头闲散的、看似毫无价值的资源, 对它们进行创造性重组以快速应对瞬息万变的市场已然成为其创造价值 and 构建能力的最佳选择^[18]。因而创业拼凑也是新创企业成长过程中不可或缺的行为之一。从已有文献中发现创业拼凑可以通过三种方式对新创企业绩效产生影响(见表 1)。最后, 作为创业过程中发现和开发机会、整合资源的主体, 创业团队成为新创企业的关键组成要素^[14]。基于组织学习理论, 新创企业的创业者以及创业企业中的雇员在创业过程中创造、分享和运用知识进行创业学习, 这个互动学习的过程可以促进组织获得新的创造性知识。新旧知识的融合促进知识资源的增加和创业能力的提高, 进而促进新创企业绩效的提升^[19-20]。所以可以看到, 新创企业绩效的提高也离不开创业团队的创业学习过程。通过文献梳理

可知, 创业学习可以通过三种方式对新创企业绩效产生影响(见表1)。通过梳理分析文献, 可以清晰地总结出5个前因条件对新创企业绩效的影响方式, 如表1所示:

表1 各前因条件影响结果(新创企业绩效)的方式

前因条件	影响结果(新创企业绩效)的方式
环境动态性	1. 创业机会就存在于客观环境之中。随着环境的不断变化, 拥有高创业机会识别能力的新创企业会更容易产生创造创新性的产品或服务的想法, 建立先动优势, 赢得高水平的新创企业绩效 2. 在动态性的环境中, 新创企业必须能够快速组织资源来解决资源约束的困境。因此懂得进行创业拼凑的新创企业就能摆脱资源限制实现有效的绩效提升, 甚至超过资源丰富的企业 3. 由于各种因素都变得难以预测, 新创企业已有的知识和技能遭到迅速贬值甚至枯竭。具备高度创业学习能力的组织就能够通过不断学习获取响应环境变化的有效知识, 从而赢得竞争优势以获取高绩效
创业导向	1. 创业导向→创业机会识别→新创企业绩效 2. 创业导向→创业拼凑→新创企业绩效 3. 创业导向→创业学习→新创企业绩效
创业拼凑	1. 创业拼凑→新创企业绩效 2. 创业拼凑→创业机会识别→新创企业绩效 3. 创业拼凑→创业学习→新创企业绩效
创业学习	1. 创业学习→新创企业绩效 2. 创业学习→创业机会识别→新创企业绩效 3. 创业学习→创业拼凑→新创企业绩效
创业机会识别	创业机会识别→新创企业绩效

基于以上分析发现, 环境与组织因素对新创企业绩效水平的高低具有显著影响, 但是各因素之间的复杂关系使得它们对新创企业绩效产生的影响变得不明晰。现有研究局限于环境或组织因素的某一层面, 两个层面的要素究竟是如何匹配实现多元联动以影响新创企业绩效的尚不明确, 这忽视了创业情境下多重因素并发的组态效应, 导致现有研究结论不一致。实际上, 采用整体多元的视角来看待创业这个受多种因素影响的复杂过程是非常必要的^[21]。创业本身就是一个

多维的动态过程, 对于新创企业绩效驱动机制的研究应在动态环境的背景下探求组织文化、资源与能力、创业者等一切有关联的创业要素之间的复杂关系, 弄清要素间是如何对新创企业绩效产生作用的^[22]。所以, 本研究整合环境与组织两个层面的要素来探讨新创企业其环境与组织因素之间到底是如何匹配、如何协同联动以获得持续竞争优势并实现高绩效的。本文构建了环境和组织2个层面的5个因素之间的新创企业绩效驱动机制模型(如图1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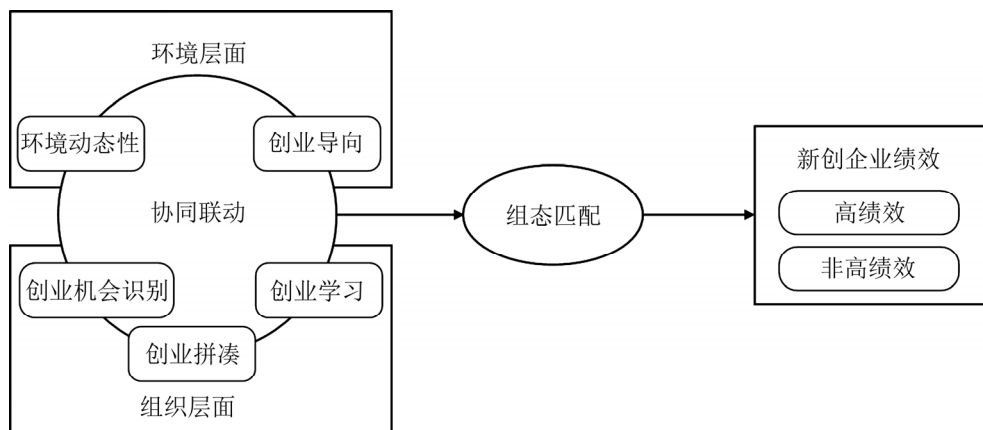


图1 新创企业绩效驱动机制模型图

三、研究设计

(一) 数据收集

本研究主要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进行数据的收集, 调研对象主要是成立时间在 8 年以内的处于初创期或成长阶段的创业企业。项目组主要依托东华大学的“尚创汇”大学生创新创业孵化基地以及 MBA、EMBA 成员所在的企业, 并充分利用项目组成员的社会网络资源。研究共发放问卷 302 份, 样本数据主要来自上海市、江苏省、河北省等地, 经剔除重大不完整和有明显错误选项问卷, 得到有效问卷 237 份, 问卷回收率为 78.48%。

由于在调查过程中是一个人独立填写问卷, 这种自我报告的方法避免不了被调查对象自我感觉良好的可能。因此, 在统计上, 本研究采用 Harman 单因素方法检验, 对所有题项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 结果显示, 在未旋转的情况下, 第一公因子的方差解释百分比为 23.538%, 小于 40%, 说明本研究的共同方法偏差不严重。

根据 QCA 方法对研究样本的数量要求, 样本量应该尽可能涵盖可能导致特定结果的前因组态的所有情况。本研究欲探讨环境与组织 2 个层面 5 个要素的组合对新创企业绩效的影响, 理论上企业数至少应该有 25 个^[23], 237 个样本数据在理论上已经覆盖可能存在的所有企业类型, 可以清晰地区分随机数据和真实数据, 且可保证研究结果的内部效度。

(二) 变量测量及描述性统计分析

本研究采用国内外创业领域学者开发并经国内众多学者结合中国情境加以修改的成熟量表, 以保证量表的信度和效度, 且除了环境动态性和创业机会识别量表采用 Likert-5 评分法外, 其余量表均采用李克特 7 级评分法, 1~5(7)表示从“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

本研究对环境动态性的测量借鉴张玉利^[24]为适应中国新创企业的情境开发的 4 个题项的量表。该量表通过了信效度检验, 并被广泛应用。

对于创业导向的测量, 本研究借鉴 Covin 和 Slevin^[13]在 Miller 研究的基础上开发的由 9 个题项组成的三个维度(创新性、超前行动性和风险承

担性)量表, 该量表受到了后续学者较为广泛的采纳。

对于创业拼凑的测量, 本研究采用已经被广泛使用的 Senyard 等^[25]开发的 8 个题项的单维度量表。

借鉴被国内学者广泛使用的 Atuahene-Gima 和 Murray^[26]开发的包含利用式学习和探索式学习两个维度的量表对创业学习进行测量, 每个维度 5 个题项, 共包括 10 个题项。

对于创业机会识别的测量, 本研究借鉴 Bhava^[27]两个维度的量表, 其中包括创业机会可盈利性识别的 3 个题项和创业机会可行性识别的 4 个题项。

借鉴 Zahra^[5]的研究成果, 采用主观评价绩效的方式, 将新创企业绩效分为生存绩效和成长绩效两个维度。本研究采用共包括 6 个题项的量表来进行测量, 如“相对于竞争对手, 企业市场占有率较高”“企业未来销售增长性预期较好”等。

(三) 信效度分析

首先, 由表 2 的信效度分析可知, 六个量表的 Cronbach's Alpha α 值均大于 0.7, 说明量表的整体可靠性较好, 内部一致性较高, 并且各量表的组合信度(CR)均大于临界值 0.6, 可见量表均具有良好的建构信度。其次, 本研究所有构念与其测量题项之间的路径系数的标准化最小值均大于 0.5, 即六个构念的所有因子负荷量值介于 0.50~0.95 之间, 并且所有潜在变量的平均方差抽取量(AVE)均大于阈值 0.5, 说明本问卷具有非常理想的聚合效度。

当一个变量的 AVE 值的平方根大于所有与该变量相关的相关系数值时, 则说明量表具备良好的区分效度^[28]。如表 3 所示, 显示了本研究所有构念 AVE 值的平方根以及相关系数值。经分析可知, 各构念的 AVE 平方根均在 0.93 以上, 而相关系数值均在 0.85 以下, 满足 AVE 的平方根大于其相邻非对角线上的相关系数值。因此, 本研究各构念之间存在显著差异, 具有良好的区分效度。

综上分析可知, 本研究所有量表的信度和效度都非常理想, 符合标准要求。

表2 信度和效度分析表

潜在变量	维度	最小因子负荷	CR	AVE	Cronbach's Alpha α
环境动态性	单维度	0.775	0.917	0.736	0.879
创业导向	创新性	0.559	0.920	0.567	0.896
	超前行动性 风险承担性				
创业拼凑	单维度	0.799	0.949	0.697	0.936
创业学习	利用式学习	0.793	0.964	0.730	0.943
	探索式学习				
创业机会识别	可盈利性识别	0.652	0.916	0.609	0.903
	可行性识别				
新创企业绩效	生存绩效	0.755	0.938	0.718	0.925
	成长绩效				

表3 区分效度检验结果

变量	1	2	3	4	5	6
1.环境动态性	0.938					
2.创业导向	0.654	0.947				
3.创业拼凑	0.832	0.644	0.967			
4.创业学习	0.569	0.712	0.703	0.971		
5.创业机会识别	0.473	0.703	0.828	0.834	0.950	
6.新创企业绩效	0.581	0.689	0.844	0.812	0.819	0.962

注：N=237，对角线加粗字体为 AVE 的平方根

(四) 变量的校准

该步骤是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的最关键一步，校准的核心是赋予变量以“意义”。具体来说，为了使用 fsQCA 方法，需要将常规变量转化成模糊集数据，就是将原始数据转换为 0 到

1 之间的模糊集隶属度值。把变量校准为集合，需要研究者依据理论或实际的外部知识或标准设定 3 个锚点：完全隶属、交叉点和完全不隶属^[29]。整个操作过程必须公开透明，经得起推敲。

由于根据调查量表的刻度进行校准可能会提供不太有意义的结果，参考以往的研究^[30]，根据本研究的研究问题和数据特点，因为均值反映的是不同企业的平均水平，标准差代表着被调查企业相互之间的差别，所以本研究将 5 个前因条件和 1 个结果变量的 3 个校准锚点分别设置为各变量的“均值+标准差”“均值”以及“均值-标准差”。而对于非高创业绩效而言，其校准规则与高创业绩效正好相反，即取高创业绩效的非集。前因条件及结果的校准锚点如表 4 所示。

表4 前因条件及结果的校准锚点

	研究变量	目标集合	完全不隶属	交叉点	完全隶属
环境层面	环境动态性	高环境动态性	1.660 22	2.785 7	3.911 18
	创业导向	高创业导向	3.689 39	4.696 5	5.703 61
条件变量	创业拼凑	高创业拼凑	3.995 23	4.958 3	5.921 37
	创业学习	高创业学习	4.080 39	5.066 7	6.053 01
组织层面	创业机会识别	高创业机会识别	2.206 79	3.191 6	4.176 41
	新创企业绩效	高创业绩效	3.580 48	4.678 6	5.776 72
结果变量	新创企业绩效	非高创业绩效	5.776 72	4.678 6	3.580 48

四、实证分析

(一) 必要条件分析

经校准后，将原始数据都转换为模糊集隶属分数，得到了对应的模糊集数据表。必要条件分

析是在进行模糊集真值表程序分析之前不可缺少的重要一步。因为如果某个前因条件真的是导致结果发生的必要条件，在进行真值表分析时它会在简约解(纳入“逻辑余项”的解)的报告结果

中被剔除掉, 这样就会导致核心条件的认定出现不必要的错误^[21, 31]。

在进行必要条件分析(Necessary Conditions)时, 判断某个前因条件或者它的否定是否为导致结果发生的必要条件的依据是一致性值(Consistency)高于 0.9, 这能够说明结果的集合在多大程度上是条件集合的子集^[32-33]。高/非高创业绩效的必要条件分析结果如表 5 所示。从表 5 必要条件分析的一致性可知, 高创业拼凑(一致性 0.923)、高创业学习(一致性 0.916)和高创业机会

识别(一致性 0.926)是产生高创业绩效的必要条件, 缺乏创业拼凑(一致性 0.907)和缺乏创业机会识别(一致性 0.906)是非高创业绩效的必要条件。这意味着各个单项条件对新创企业绩效具有一定的解释力度, 构成了产生结果的瓶颈。虽然结果表明单个条件的集合对结果集具有较好的解释力, 但这些前因条件又都不能完全解释结果, 因为所有前因条件指标的一致性值均小于 1^[34]。因此, 有必要对前因条件进行组态分析, 进一步探索产生高/非高创业绩效的不同前因构型。

(二) 组态分析

将 5 个前因条件纳入 fsQCA3.0, 对 237 份数据进行分析。为了充分考虑案例的覆盖率和降低矛盾组态, 遵循 Ragin^[35]研究提出的标准, 将案例频数阈值设为 2, 一致性阈值设置为 0.9, 并结合 PRI 一致性大于 0.75。如表 6 所示, 模糊集分析得出新创企业产生高创业绩效的组态有 4 个, 且 4 个组态的一致性指标分别为 0.960、0.990、0.979、0.976, 显示出较高的一致性^[36]。这说明 4 个组态都是新创企业产生高创业绩效的充分条件。同时, 解的一致性指标为 0.957, 则进一步说明了覆盖绝大多数案例的 4 个组态也是使新创企业产生高创业绩效的充分条件。模型解的覆盖度为 0.874, 说明 4 个组态解释了促进新创企业

表 5 新创企业绩效的必要性检测

条件变量	结果变量		
	高创业绩效	非高创业绩效	
环境	ED(环境动态性)	0.600	0.567
层面	~ED	0.504	0.566
	EO(创业导向)	0.556	0.580
	~EO	0.554	0.560
	EB(创业拼凑)	0.923	0.264
	~EB	0.210	0.907
组织	EL(创业学习)	0.916	0.285
层面	~EL	0.226	0.896
	EOI(创业机会识别)	0.926	0.278
	~EOI	0.218	0.906

注: “~”表示逻辑运算的“非”

表 6 产生高/非高创业绩效的组态

条件变量	产生高创业绩效的组态(High EP)				产生非高创业绩效的组态(Not High EP)	
	H1	H2	H3		NH1	NH2
			H3a	H3b		
环境动态性(ED)		⊗	●	●		●
创业导向(EO)		⊗	●	●		⊗
创业拼凑(EB)	●	●	●		⊗	
创业学习(EL)	●		●	●	⊗	●
创业机会识别(EOI)	●	●		●	⊗	⊗
一致性	0.960	0.990	0.979	0.976	0.989	0.954
覆盖度	0.847	0.305	0.260	0.262	0.812	0.311
唯一覆盖度(Unique Coverage)	0.434	0.008	0.008	0.010	0.504	0.035
解的一致性(Solution Consistency)		0.957			0.973	
解的覆盖度(Solution Coverage)		0.874			0.840	

注: ●代表核心因果条件存在, ⊗代表核心因果条件缺失, ●代表边缘因果条件存在, ⊗代表边缘因果条件缺失, “空白”表示组态中该条件既可以出现也可以不出现

产生高创业绩效约 87.4%的原因。另外, 结果报告出有 2 条能够使得新创企业产生非高创业绩效的组态, 总体一致性是比较高的, 达到了 0.973, 覆盖度也达到了 0.84, 即说明不仅构成了非高创业绩效的充分条件, 而且解释了约 84%的非高创业绩效的原因。

1. 新创企业高绩效驱动机制分析

在环境与组织多种因素配置下, 本研究发现了 4 条促进新创企业产生高绩效的组态(路径)。鉴于各组态都涉及组织层面的核心条件创业拼凑(EB)、创业学习(EL)和创业机会识别(EOI), 为了更好地比较 4 条不同的组态(路径)在环境层面的差异, 本研究归纳出 3 种新创企业高绩效驱动机制构型模式。

(1) 构型 1: $EB \times EL \times EOI$, 表明无论新创企业是否遭受着高度动态的外部环境或者是否具有创业导向式的内部创业文化, 只要企业具有高度的创业机会识别水平, 懂得进行创业拼凑去创造性利用资源, 再加上创业团队不断进行创业学习以发挥主体的关键作用, 就会促进新创企业产生高水平的绩效。这种驱动机制模式也恰恰验证了蒂蒙斯的创业过程模型, 创业过程三要素缺一不可。机会、资源和团队之间动态匹配并始终保持平衡的过程就是新创企业实现绩效提升的核心。

创业团队为了抓住创业初始阶段最核心的要素, 需要做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快速整合资源来识别和发掘创业机会^[4]。但是, 碍于新创企业面临着资源约束困境, 团队成员就要对已有的经验与知识或者全新的知识进行学习, 提高自身的机会识别能力和资源整合能力, 这样就促进了创业拼凑行为的产生。新创企业创业者以较低的成本将手边不断积攒的零散、廉价、以为无用的资源重新整合, 合理配置, 创造出独特的产品以实现其新价值, 这样有助于新创企业对市场做出快速反应, 抓住稍纵即逝的创业机会, 建立难以复制的竞争优势, 抢占市场份额, 进而促进新创企业创业绩效的提升。

(2) 构型 2: $\sim ED \times \sim EO \times EB \times EOI$, 表明无论新创企业是否具有高度的创业学习水平, 当其处于缺乏高动态性的外部环境中且也缺乏高创

业导向型的内部文化时, 只要企业懂得通过创业拼凑整合和创造性利用相应的资源, 并且拥有高度的创业机会识别水平, 就会促进产生高创业绩效。具体地说, 创业拼凑是连接机会识别与现有资源的纽带, 对资源用途的重新审视和最终选择是发现或创造机会的一种方法或途径^[37]。新创企业唯有用不同的眼光从不同的角度审视手头现有资源, 才可能发现商机。通过资源调度, 用一种资源替换组合中的另一种资源, 直到预期的资源组合出现, 如此解决了资源约束问题, 进而也达到了识别已有的具有可行性和盈利性的机会或创造新机会的目的^[25], 从而开发并利用这些创业机会, 打造全新产品以提高市场份额, 促进创业绩效的提高。

值得注意的是, 在这种组态下覆盖的案例, 创业学习并不是促进该类新创企业产生高绩效的必要条件, 有无高的创业学习水平并不重要。虽然团队的创业学习是关键因素, 但在创业初期, 只要拥有了创业所需的资源与好的创业机会就已经解决了创业的两大核心问题^[19]。更何况创业者在进行机会识别和资源拼凑时, 无形中已经在不断试错的过程中得到了学习和成长。这一类型的企业一般都是刚成立不久(经营时间 ≤ 1 年), 它们还没有来得及感受到外部环境的动态变化带来的巨大竞争, 也还没有形成良好的创业导向型的内部创业文化氛围, 只是拼凑了现有的资源, 识别到了所在领域的机会, 看到了一定高的短期绩效。

(3) 构型 3: 这一类型包括了两个子模式(H3a 和 H3b), 它们在环境层面上都表现为: 新创企业处于高度动态性的外部环境中且企业拥有高创业导向式的内部文化。这一类型的新创企业与 H2 中的不同, 它们虽然正处于比较高水平的动态性环境中, 时刻面临着生死存亡的重要战略抉择, 但也拥有较浓的创业导向型的内部创业文化氛围。著名企业管理理论家杨先举教授^[12]在将传统文化运用到企业管理中就表明, “一个拥有着强大凝聚力的创业团队一定是有着共同价值、理念或信仰的创业文化的群体, 表明拥有共同的创业导向, 如此才能迸发出无穷大的能量”。所以, 这种模式下的新创企业在共同的价值观和信

念体系指引下, 组织不会失去开发新产品引进新技术的动力, 仍然保持着不断进取的创业学习精神, 无形中会建立起强大的学习型组织。创业学习成为高创业绩效产生的必要条件。因此可以发现, 这一类型的企业大多拥有高的创业学习水平, 表现出的创业活动形式主要是抢先研发出具有独特竞争优势的新产品, 或是开辟新市场或创新商业模式, 因为这对新创企业获得高绩效并实现自身的生存及发展将大有裨益。

具体来说, H3a: $ED \times EO \times EB \times EL$, 这第一种模式指出, 当处于高度动态的环境中时, 面对复杂的竞争和市场环境, 拥有高创业导向的新企业在高度的内部创业文化氛围下会积极寻求新的发展机遇, 而是否保持高创业机会识别对新创企业的高绩效水平不会造成关键影响。在创新性、先动性和风险承担性的文化氛围指导下, 当企业面对一切未知又毫无把握的创业结果时, 组织仍敢于承担风险, 快速决策并大胆行动, 掌握住先发优势, 学习创业知识并利用创新性思维进行资源拼凑以充分发挥有限的资源和能力的作用, 从而搜寻和把握一切可能的机会去提高企业存活的可能性, 进而产生高绩效。H3b: $ED \times EO \times EOI \times EL$, 与第一种模式相比, 这第二种驱动模式却强调创业机会识别的作用, 而创业拼凑的有无就不是关键了。虽然说在创业过程中关键的创业要素不能少了资源, 但是当企业拥有了高素质的学习型团队以及绝佳创业机会的时候, 所需的各种资源自会源源不断^[38]。所以无论是否有高水平的创业拼凑, 只要新创企业拥有高度的创业学习水平, 一旦识别到创业机会就会促使高创业绩效的产生。

通过对比分析 4 个组态, 根据覆盖度指标可以发现, 组态 H1 接近 H2 的 3 倍, 超过了 H3a 和 H3b 的 3 倍之多, H1 解释了结果的 84.7%, 它的唯一覆盖度也接近 50%(43.4%), 而另外 3 条路径的唯一覆盖度最大的也仅为 1%。这说明大多数新创企业都是通过第一条路径实现高创业绩效的, 也说明了创业过程三要素的组态对新创企业产生高绩效的作用。组态 H2、H3a 和 H3b 的覆盖度分别是 30.5%、26%和 26.2%, 说明环境与组织因素相互依赖共同影响着新创企业高

绩效的产生, 并且实现新创企业高绩效的路径具有多样性。这不仅回答了前文提到的新创企业的组织与环境因素如何匹配去获得竞争优势以提升新创企业绩效的问题, 也解释了为什么以往研究得出的新创企业绩效影响机制会不一致。另外, 对比 3 种驱动机制模式还发现, 不管环境层面的两个要素存在与否, 组织层面的要素只要有两个存在, 就能够促进新创企业产生高绩效。

2. 新创企业非高绩效驱动机制分析

QCA 方法具有不同于传统分析方法的因果非对称性的特点, 这意味着导致新创企业产生高绩效的原因和产生非高绩效的原因是不一样的, 也即产生高绩效原因的反面条件并不一定是产生非高绩效的原因。因此, 为了更深入且全面地探索新创企业产生高绩效的驱动机制, 本研究进一步分析了非高创业绩效的组态(路径)。结果如表 6 所示。

NH1: $\sim EB \times \sim EL \times \sim EOI$, 表明无论新创企业是否处于动态性的环境中或者是否拥有高创业导向的内部文化, 只要组织没有高水平的创业机会识别, 创业拼凑和创业学习(边缘条件)的水平也不高, 就会抑制新创企业的绩效水平。这一组态类型再一次巩固了蒂蒙斯创业过程模型的权威地位, 机会(高创业机会识别)、资源(创业拼凑)和团队(创业学习)三要素缺乏一个都不能使新企业的创业过程完整, 更不能实现新创企业的高绩效。

NH2: $ED \times \sim EO \times EL \times \sim EOI$, 表明无论新创企业是否拥有高水平的创业拼凑, 当企业处于动态性的环境中时, 只要没有高创业导向式的内部创业文化, 创业机会识别的水平也不高, 即使企业拥有高度的创业学习水平, 也会抑制新创企业的绩效水平。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或许是: 当面临顾客需求、产品技术、政府政策等外界环境的变化时, 而且变化的速度和幅度是难以预测的, 再加上企业内部没有高创业导向式的创业文化, 没有创新性、先动性和风险承担性的观念指导, 新创企业即使能够为了应对这种“内忧外患”的局面进行创业学习去获取与吸收新的知识和能力, 但是组织本可以在这种变化的局势中寻求商机, 却因为缺乏高水平的创业机会识别能力而

错失潜在的良机。所以,在这种资源稀缺的环境下,不管企业是否进行创业资源拼凑,由于错失良机,都已经不那么重要了。

通过比较 NH1 和 NH2 两种组态的覆盖度指标发现,组态 NH1 超过 NH2 的 2 倍,它们分别解释了结果的 81.2%和 31.1%,而且 NH1 的唯一覆盖度为 50.4%,NH2 仅为 3.5%,即说明主要是因为 NH1 这种组态抑制了大部分新创企业的绩效水平。

通过分析以上 6 种影响新创企业绩效水平的组态发现,非高绩效的 2 条路径并不是高绩效的 4 条路径的对立面,也就是说促进新创企业绩效水平的路径和抑制绩效的路径具有非对称性的特征。

五、结论与启示

(一) 研究结论

本文以组态理论为核心,从整体论的视角出发,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对 237 个样本企业进行分析,探究了由环境与组织 2 个层面的 5 个前因条件组成的不同组态与新创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挖掘出多条不同的新创企业绩效提升路径,明晰了新创企业的组织因素应该怎样与环境因素进行匹配来获取竞争优势并实现高绩效,解释了以往研究中新创企业绩效影响机制不一致的问题,最终回答了本文提出的几个具体问题,为我国新创企业的生存与发展提供了一些理论和实践上的参考。本研究最终得出以下几个主要结论。

第一,在本研究的 5 个前因条件中,高创业机会识别、高创业拼凑和高创业学习都是新创企业产生高绩效的必要核心条件,缺乏高创业机会识别和缺乏高创业拼凑是非高绩效产生的核心必要条件。这说明组织层面的 3 个要素条件之中每个单独的条件都是导致新企业产生高绩效必须存在的条件,都可以影响绩效的水平,但是这 3 个要素条件的其中一个存在并不能必然保证新创企业能够产生高绩效。同理,也说明缺乏高创业机会识别或缺乏高创业拼凑时,也都是能够造成新创企业产生非高绩效必须存在的条件,但它们的存在也并不能保证新创企业必然产生非高绩效。

第二,新创企业绩效的实现路径是具有多样性的,并且只要组织层面有两个要素存在,就能够促进新创企业产生高创业绩效。新创企业产生高绩效的驱动机制分为 4 条路径并被概括为 3 种模式。其中,创业过程三要素的组态(高创业机会识别、高创业拼凑和高创业学习)是影响新创企业产生高绩效的主要路径。

第三,抑制新创企业绩效水平的路径和促进绩效的路径具有非对称性的特征。通过分析以上 6 种影响新创企业绩效水平的组态发现,非高创业绩效的驱动机制有 2 条路径,与 4 条产生高绩效的路径驱动机制之间存在非对称性关系。也就是说,非高绩效的 2 条路径并不是高绩效的 4 条路径的对立面。这不仅充分展示了 QCA 方法因果非对称的特点,也使得对新创企业绩效驱动机制的探讨更深入全面。

(二) 管理启示

(1) 无所畏惧,强化创业拼凑、学习与机会识别能力。存在多条驱动新创企业产生高绩效的路径,其中不管外部环境是否具有高动态性,也不管组织内部文化环境是否拥有高创业导向,只要新创企业能够将自身的创业机会识别、创业拼凑和创业学习能力进行完美匹配,就可以为其产生高创业绩效提供一个具有较高解释力度的原因。无论是这条使新创企业产生高绩效的最高效路径,还是那条使其产生非高绩效的最高效路径,都一次又一次为 Timmons 的创业过程模型在中国情境下的合理性提供了有力证据。创业三要素(机会、资源和团队)不可或缺,所以不管内外部环境如何,新创企业都要强化自身的创业机会识别能力、拼凑资源的能力和创业学习的能力。

(2) 适应环境,加强培养组织的相关能力。对于没有遭受动态性环境且尚缺乏高创业导向型内部文化的新创企业而言,企业管理者应注重对资源拼凑能力和机会识别能力的培养。因为处于这种状态下的企业的共同特征是成立时间较短(尚不到 1 年),它们只要解决了资源获取和机会识别这创业中的两大核心问题,就可以实现短期高绩效,所以必然需要新创企业加强培养自身的创业拼凑能力和创业机会识别能力。对于面对高动态性环境但拥有较强创业导向的新创企业

而言, 企业管理者必须加强组织的创业学习能力。对于这种情况下的企业, 研究结果提供给企业管理者两条参考路径, 一是在创新、先动和风险承担的战略指引下, 通过学习创业知识, 能够利用创新性思维进行创业拼凑, 从而去搜寻和把握一切提高绩效的机会; 二是不管创业拼凑的水平如何, 只要识别到好的创业机会并且拥有一个有能力的学习型团队, 相信肯定能够吸引到创业所需的资源。但无论管理者选择哪条路径, 要想获取高创业绩效, 创业学习能力的培养都是必要的。

(3) 不走极端, 把握关键核心因素。影响新创企业产生高/非高绩效的原因是非对称性的, 这启示新创企业管理者应理智看待企业绩效高或非高的原因, 不能根据经验盲目地通过总结产生高绩效的原因来反向推导非高绩效的原因。也就是说, 管理者不要想当然地认为新创企业产生高绩效的对立面都是企业不能实现高绩效而无法发展和成长的原因, 同样地, 也不应极端地认为只要彻底改变了使企业产生非高创业绩效的所有因素就可以帮助企业获得高绩效以实现持续成长。最重要的是, 要想解决我国新创企业生存和成长问题困境一定要去把握好关键核心因素, 亟需客观正确地理解外部环境因素与组织内部因素的联系, 使组织能够更好地匹配于环境, 方可获取持续竞争优势, 进而产生高创业绩效, 从而实现发展与成长。

参考文献:

- [1] 祝振铎. 创业导向、创业拼凑与新企业绩效: 一个调节效应模型的实证研究[J]. 管理评论, 2015, 27(11): 57-65.
ZHU Zhenduo. Entrepreneurial orientation, entrepreneurial bricolage and new firm performance: Empirical research of a moderating effect model[J]. Management Review, 2015, 27(11): 57-65.
- [2] ALDRICH H E, MARTINEZ M A. Many are called, but few are chosen: An evolutionary perspective for the study of entrepreneurship[J]. Entrepreneurship Theory and Practice, 2001, 25(4): 41-57.
- [3] 刘人怀, 王娅男. 创业拼凑、创业学习与新企业突破性创新的关系研究[J]. 科技管理研究, 2017, 37(17): 1-8.
- LIU Renhuai, WANG Yanan. Empirical study on relationship among entrepreneurial bricolage, entrepreneurial learning and radical innovation of new ventures[J].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anagement Research, 2017, 37(17): 1-8.
- [4] 闫华飞, 孙元媛. 二元创业学习、创业拼凑与新企业成长绩效的关系研究[J]. 管理学报, 2019, 32(3): 41-51.
YAN Huafei, SUN Yuanyuan. Relationship between dual entrepreneurial learning, entrepreneurial bricolage, and the growth performance of new enterprises[J]. Journal of Management, 2019, 32(3): 41-51.
- [5] ZAHRA S A. Technology strategy and financial performance: Examining the moderating role of the firm's competitive environment[J].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1996, 11(3): 189-219.
- [6] MILLER D, FRIESEN P H. Archetypes of strategy formulation[J]. Management Science, 1978, 24(9): 921-933.
- [7] COVIN J G, LUMPKIN G T. Entrepreneurial orientation theory and research: Reflections on a needed construct[J]. Entrepreneurship Theory and Practice, 2011, 35(5): 855-872.
- [8] TIMMONS J A. New venture creation[M]. Singapore: McGraw-Hill, 1999.
- [9] MILLER D, FRIESEN P H. Innovation in conservative and entrepreneurial firms: Two models of strategic momentum[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1982, 3(1): 1-25.
- [10] ENSLEY M D, PEARCE C L, HMIELESKI K M.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environmental dynamism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ntrepreneur leadership behavior and new venture performance[J].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2005, 21(2): 35-42.
- [11] ECKHARDT J T, SHANE S A. Opportunities and entrepreneurship[J]. Journal of Management, 2003, 29(3): 333-349.
- [12] 杨先举. 传统文化与经营管理[J]. 企业文化, 2004(11): 12-14.
YANG Xianju.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management[J]. Corporate Culture, 2004(11): 12-14.
- [13] COVIN J G, SLEVIN D P. Strategic management of small firms in hostile and benign environments[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1989, 10(1): 75-87.
- [14] 张玉利, 杨俊, 于晓宇, 等. 创业研究经典文献述评[M]. 北京: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8.

- ZHANG Yuli, YANG Jun, YU Xiaoyu, et al. A review of classic literature on entrepreneurship research[M]. Beijing: Machinery Industry Press, 2018.
- [15] 张红, 葛宝山. 创业学习、机会识别与商业模式——基于珠海众能的纵向案例研究[J]. 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 2016, 37(6): 123-136.
- ZHANG Hong, GE Baoshan. Entrepreneurial learning, opportunity identification and business model: A longitudinal case study on Zhuhai Joinet[J]. Science of Science and Management of S.& T., 2016, 37(6): 123-136.
- [16] GUO H, TANG J T, SU Z F. Opportunity recognition and SME performance: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business model innovation[J]. R&D Management, 2017, 47(3): 431-442.
- [17] AN W, ZHAO X, CAO Z. How bricolage drives corporate entrepreneurship: The roles of opportunity identification and learning orientation[J]. Journal of Product Innovation Management, 2018, 35(1): 49-65.
- [18] BAKER T, NELSON R E. Creating something from nothing: Resource construction through entrepreneurial bricolage[J].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2005, 50(3): 329-366.
- [19] 蔡莉, 单标安, 汤淑琴, 等. 创业学习研究回顾与整合框架构建[J]. 外国经济与管理, 2012, 34(5): 1-8, 17.
- CAI Li, SHAN Biaoan, TANG Shuqin, et al. Review of entrepreneurship learning research and construction of integrated framework[J]. Foreign Economics & Management, 2012, 34(5): 1-8, 17.
- [20] 张秀娥, 徐雪娇. 创业学习与新创企业成长: 一个链式中介效应模型[J]. 研究与发展管理, 2019, 31(2): 11-19.
- ZHANG Xiue, XU Xuejiao. Entrepreneurial learning and growth of new ventures: A chain mediating effect model[J]. R&D Management, 2019, 31(2): 11-19.
- [21] 程建青, 罗瑾琰, 杜运周, 等. 制度环境与心理认知何时激活创业? ——一个基于QCA方法的研究[J]. 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 2019, 40(2): 114-131.
- CHENG Jianqing, LUO Jinlian, DU Yunzhou, et al. When institutional contexts and psychological cognition can stimulate entrepreneurship activity?: A study based on QCA approach[J]. Science of Science and Management of S.& T., 2019, 40(2): 114-131.
- [22] BUSENITZ L W, SHEPHERD D, NELSON T, et al. Entrepreneurship in emergence: Past trends and future directions[J]. Journal of Management, 2003, 29(3): 285-308.
- [23] RAGIN C C. The comparative method: Moving beyond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strategies[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4.
- [24] 张玉利, 赵都敏. 手段导向理性的创业行为与绩效关系[J]. 系统管理学报, 2009, 18(6): 631-637.
- ZHANG Yuli, ZHAO Dumin. Empirical research on relationship between effectual entrepreneurial behavior and new firm's performance[J]. Journal of Systems & Management, 2009, 18(6): 631-637.
- [25] SENYARD J, BAKER T, STEFFENS P. Bricolage as a path to innovativeness for resource-constrained new firms[J]. Journal of Product Innovation Management, 2014, 31(2): 211-230.
- [26] ATUAHENE-GIMA K, MURRAY J Y. Exploratory and exploitative learning in new product development: A social capital perspective on new technology ventures in China[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Marketing, 2007, 15(2): 1-29.
- [27] BHAVE M P. A process model of entrepreneurial venture creation[J].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1994(9): 223-242.
- [28] FORNELL C, LAREKER D F. Evaluating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s unobservable variables and measurement error[J]. Journal of Marketing Research, 1982, 18(1): 39-50.
- [29] 杜运周, 贾良定. 组态视角与定性比较分析(QCA): 管理学研究的一条新道路[J]. 管理世界, 2017(6): 155-167.
- DU Yunzhou, JIA Liangding. Configuration perspective and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QCA): A new way of management research[J]. Management World, 2017(6): 155-167.
- [30] FISS P C. Building better causal theories: A fuzzy set approach to typologies in organization research[J].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2011, 54(5): 393-420.
- [31] 杜运周, 李永发. QCA 设计原理与应用: 超越定性定量研究的新方法[M]. 北京: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9.
- DU Yunzhou, LI Yongfa. QCA design principles and applications: New methods beyond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research[M]. Beijing: Machinery Industry Press, 2019.
- [32] 张明, 杜运周. 组织与管理研究中 QCA 方法的应用:

- 定位、策略和方向[J]. 管理学报, 2019, 16(9): 1312-1323.
- ZHANG Ming, DU Yunzhou.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QCA) in 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 research: Position, tactics, and directions[J]. Chinese Journal of Management, 2019, 16(9): 1312-1323.
- [33] SCHNEIDER C Q, WAGEMANN C. Set-theoretic methods for the social sciences: A guide to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
- [34] RIHOUX B, RAGIN C C. Configurational comparative methods: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QCA) and related techniques[M]. Thousand Oaks: SAGE Publications, 2009.
- [35] RAGIN C C. Social research: Evaluating their consistency and coverage[J]. Political Analysis, 2006, 14(3): 291-310.
- [36] RAGIN C C. Redesigning social inquiry: Fuzzy sets and beyond[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8.
- [37] 于晓宇, 李雅洁, 陶向明. 创业拼凑研究综述与未来展望[J]. 管理学报, 2017, 14(2): 306-316.
- YU Xiaoyu, LI Yajie, TAO Xiangming. Literature review on entrepreneurial bricolage and future outlook[J]. Chinese Journal of Management, 2017, 14(2): 306-316.
- [38] 徐广平, 张金山, 杜运周. 环境与组织因素组态效应对公司创业的影响——一项模糊集的定性比较分析[J]. 外国经济与管理, 2020, 42(1): 3-16.
- XU Guangping, ZHANG Jinshan, DU Yunzhou. The impact of environmental and organizational configuration on corporate entrepreneurship: A fuzzy-set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J]. Foreign Economics & Management, 2020, 42(1): 3-16.

On the impact of configuration effect of environmental and organizational on new venture performance: A fuzzy-set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XU Weimin¹, LIU Xinrui¹, JIAO Weiwei²

(1. Glorious Sun School of Business & Management, Donghua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51, China;
2. College of Economics & Management,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of Hebei, Baoding 071000,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configuration theory,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multiple concurrent factors and causal complex mechanisms that influence the performance differences among different start-ups. The fuzzy set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method is used to analyze 237 sample firms,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ifferent configurations which are composed of two conditions at the environment level with three conditions at the organization level and the performance of new ventures is deeply explor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①High entrepreneurial opportunity identification, high entrepreneurial bricolage and high entrepreneurial learning are all necessary conditions for new ventures to produce high performance, and the lack of high entrepreneurial opportunity identification and lack of high entrepreneurial bricolage are necessary conditions for non-high performance. ②The driving mechanism of high performance of new ventures can be divided into four paths and summarized into three configuration modes. ③The path that inhibits the performance level of new ventures and the path that promotes the performance hav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asymmetry. This research has considerable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Key Words: new venture performance; driving mechanism; configuration; fuzzy-set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编辑: 何彩章]